◆文　坛

文学批评需激发汉语馨香

汉语之中有馨香，它内蕴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基因。民族虚无主义者往往否定和漠视自己民族的文字，并以此为征兆否定民族文化。中国古代杰出的诗人作家们有着重视语言的传统，他们把汉语的特点、功能琢磨得那么透，锻造得那样其光闪闪、其声铮铮，把他们那个世界书写得情深意切、意味盎然。

阅读者对中国近百年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成就的质疑，一定程度上在于这些作品不好读、不经读、不耐读，这与创作者对汉语的情感断裂有着极大关系。特别是如今断裂的既成事实，使当下的文学创作无法与中华古韵相接续。对汉语有感情，在语言的锤炼上下功夫，激发汉语的馨香，这种传统是写出好作品的关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人朱湘曾言，中国的文字是最适合作诗的，每个汉字本身就是一首诗。中国古代的批评者格外重视汉语中的诗意。押韵、平仄、对偶、对仗、用典，品词析句，一张一弛。“生”，“拙”，“绮丽”，“平淡”，“清雕琢”，或“著一字而境界全出”（王国维），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在诗话、词论、小说点评等名目繁多、卓有特色的批评文体中，批评家们充分展示了中国汉语的美感。当代文坛，不乏文学精品，但文学批评者似乎缺少了古人细推敲、细琢磨的耐心，大而化之者多，精心推敲者少，或无意或有意，忽略了汉字魔方中动人的、神奇的魔力。

更进一步讲，当代文学批评应激发汉语的馨香。许多作家是不自觉的语言大师。他们写得好，但对于怎样好，是不自觉的。这就需要批评者深入到汉语的内部，激发语言的馨香。批评家顾随评韩偓《幽窗》中的“手香红橘嫩，齿软越梅酸”两句，指出“一念便好，盖不是说‘香’是香，便连其‘红’字、‘橘’字亦刺激嗅觉，甚至‘手’字为鼻音”。这就把汉语的“弹性”张扬出来。当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已经产生了极大差异，把当代文学中语言的馨香激发出来，使汉语的无穷韵味得以传承发展，是当下文学批评的责任所在。

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文学事业自然责无旁贷。通过文学批评把汉语的张力激活，通过文学展示、激发、丰富汉字的美感，才能使作家们把当代人的生活写深写透，才能写出中国精神，才能让当代中国人体会到中国文化的温情，才会有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之作。当代文学批评应继续发掘汉语的深度和美感，寻找和辨识更多散发着汉语馨香的优秀文学作品。（2016年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孙书文）

◆杂　谈

从“引力波辐射”看科学素养提升

2月11日，美国科学家宣布，他们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第一次探测到了引力波。这项轰动世界的发现不仅证实了爱因斯坦一个世纪前的预测，也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观测宇宙的新途径。几乎与此同时，某电商网站上就出现了宣称能预防引力波的商品，如面膜、孕妇背心和肚兜，有的商品简介上甚至写着，“引力波是辐射的一种，而且辐射非常强”。

引力波到底是什么？要具体搞清楚，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于引力波是否有辐射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至少从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引力波有辐射。而所谓“引力波有辐射”的说法，源自部分商家之口。虽然也有个别商家明确表示这些是恶搞的商品，目前销售记录还为零，但鉴于一些商家借机炒作“伪概念”的先例，以及不乏一些市民自我感觉“引力波是有伤害的”，此类产品恐怕难免让一些人信以为真，并给更多人带来误导。

除了引力波被误读，此前还有手机辐射、WiFi辐射、孕妇需穿防辐射服保护胎儿等。这些模糊的概念中，一些是似是而非的夸大其词，一些则干脆是出于商业推广而刻意制造的“伪概念”。比如引力波有辐射，几乎是随着引力波被发现的新闻同时“上线”，在多数人还没弄清楚引力波的具体情况前，部分商家就先下手为强，人为制造了一个“商机”。

按理说，在信息获取相当便利的当下，求证某种说法是否真实，只要稍稍借助于一些网络查询，即可了解大概。然而就是这些看似漏洞百出的“伪概念”，却依然不乏上当者，有一些甚至还逐渐“深入人心”。这里除了有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人性弱点，社会整体科学素养的欠缺恐怕难辞其咎。中国科协开展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6.2%。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在2000年时就已高达17%。

一个公民科学素养的高低，与其个人对于科学问题的认识有关，但一个社会整体科学素养低，轻则是为一些“伪概念”“伪科学”的流行和泛滥提供温床，重则影响一个社会的判断力、科技创新力与竞争力。有专家就曾指出，中国公众随着年龄增大，科学素养水平却在下降，与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形成反差。这一现象，与民间一般认为的“越老越迷信”其实有相通之处。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我们日常性社会科普教育和宣传的缺失。

这些年，我国在一些高精尖领域的科技创新不断取得进展，但国民科学素养提升的速度似乎慢了不少。以“引力波辐射”为代表，种种与科学问题相关的“谣言”或“伪概念”的流行足以说明，科技发展和进步对公民素养的“涵养”作用还有待加强。而一个国家理想状态下的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理应包括国民科学素养的提升。有鉴于此，在强化学校正规教育中的科技知识传授力度、增加大众科普推广、创新科普方式以及建立科技创新与民众互动的有效桥梁等方面，我们仍有亟待填补的空白。（2016年2月22日《光明日报》朱昌俊）

◆观　点

“新元素”为经济学带来新的生机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时，中国和世界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这是经济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一，“新元素”会引发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进入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进而向高收入迈进的一个长时期的状态。伴随这种新常态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目标多元化，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驱动。不过，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并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德国、日本等国家早就做到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两个不同于以往这些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这两个“新元素”会引发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并且有可能产生具有思想性和一般性的研究结果。

第一是中国的规模导致的中国作为崛起的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中国进入人均中等收入与之前的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比如韩国）都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的总量：近14亿人口使得中国在只有接近美国人均GDP的1/4（PPP，即购买力平价）之时就已经同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PPP），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6%。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受其影响的全球经济都有可能出现“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状况，中国相对较高的增速使得中国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1/3左右或以上的时间，有可能并不短。

中国的规模会引发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如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品市场和贸易的影响，中国改革和市场变化对全球货币、资本和人才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是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大问题。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也有可能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中国近14亿人口的巨大规模和中等收入水平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创新供给，这类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回顾历史，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超越英国经济的时候全国人口只有7000多万。

第二是中国的制度引发的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中的最大特点或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反映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与商的关系中。在过去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东亚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像中国这样，政府如此重视经济发展，政府有如此强烈地激励去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帮助之手”。另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也造成了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这种政商关系的终结，那么未来政商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家，如何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经济新常态中新的重要问题。

其二，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出现新的生机。政商关系对经济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另一方面则是反过来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制度演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的互动，提供了验证已有理论假说和发展新理论的机会。从实证的角度来看，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新常态下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会引发经济学的创新。因此，很有可能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由此出现新的生机。

对于以上这两类由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引发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者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要使得研究兼具思想性和学术性，既抓住大问题，又符合技术严谨性，同时又达到一般性，非有创新不可。

世界经济学家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兴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研究也应该更加开放。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方式，让世界经济学家与中国经济学家一起研究那些由新常态引发的新问题，共同驱动经济学的创新。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历史的机会中，对重大问题做出既有思想性又有一般性的经济学创新。（2016年2月22日《理论周刊》钱颖一）

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四部委近日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土地储备机构新增土地储备项目所需资金，严格按照规定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从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财政资金中统筹安排，自2016年1月1日起，各地不得再向银行业金融机构举借土地储备贷款。同时规定，对清理甄别后认定为地方政府债务的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存量土地储备贷款，应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偿债资金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统筹安排，并逐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予以置换。

问题在于，在土地市场比较活跃、房地产市场比较火热的情况下，土地融资的风险还难以暴露，随着土地市场逐步清冷，房地产市场进入低迷状态，土地融资的风险越来越大，政府债务的危机也越来越严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叫停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特别是土地储备融资，就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

首先，地方政府能够支配的土地，绝大多数已经变成了资金，变成了抵押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这样的新政还有多大效果，值得关注。

其次，凡是通过土地进行融资的公司，包括平台公司、土地收储机构，如果不允许利用土地抵押进行融资，有可能风险立刻爆发。而对于多数地方来说，利用土地融资形成的债务，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依靠政府财政预算以及政府性基金根本没有能力应对风险、应付到期的土地抵押贷款，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土地收储机构能够认真地执行这样的新政吗？银行能够不与这些平台公司、土地收储机构“配合”，使其继续利用土地收储来维持债务的安全吗？这也值得高度关注。

再次，如果通过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置换，从表面看，是一个很具操作性、也是风险最小的方式，但从近两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此规模的土地融资，地方政府债券根本没有能力去置换，有的甚至可能等不到债券发行，风险就将爆发。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银行，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风险爆发，而是会继续依赖土地融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最后，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融资严重乏力、能够支配的土地已经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把目光转向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资产，包括办公大楼等非经营性资产，并将此注入平台公司等作为抵押物，从银行进行融资。这也意味着，有的政府已经到了“一穷二白”的地步，大多数能够支配的土地、资产等，都变成了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的资产，一旦债务风险爆发，后果将十分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四部门新政能否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如果仅仅把目标对准土地储备，并不足以对地方政府负债产生有效制约，特别是把地方政府能够支配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资产也全部用于平台公司融资，到底会发生怎样的风险，银行提供给平台公司的资金能有多大的安全系数，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在地方政府负债冲动仍然很强，平台公司、土地收储机构等仍然主要依靠土地进行融资的大背景下，出台这样的新政是必要的。核心在于，如何增强可操作性，如何使新政不成为摆设，如何让银行贷款不悬空，如何让新政能够对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如果债务置换不扩大范围，不扩展到平台公司、土地收储机构的所有土地性债务，那么平台公司及其收储机构的风险就相当大，新政也难以发挥明显的作用。当务之急，必须尽快叫停地方政府将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的非经营性资产用于平台公司融资的做法。（2016年2月25日《北京青年报》谭浩俊）

◆评　论

农民工市民化需有序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也是当前消化房地产库存的强大动力。但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有些倾向需要引起警惕。比如，个别地方在落实中央方针时“眉毛胡子一把抓”，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房地产去库存的核心措施，为此，不惜拿出大量资金作补贴，动之以“钱”，晓之以“利”，不顾农民工自身实际，提出为所有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优惠政策。个别地方的乡镇干部甚至上门动员农民进城买房，还美其名曰“特事特办”。

如此“特事特办”，不仅是对中央政策“念歪了经”“唱跑了调”，还为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推进埋下隐患。表面上看，农民工住房需求得到满足，房地产库存也得以消化，似乎皆大欢喜，但仔细分析，中央提出农民工市民化，前提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已进城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非泛指所有农民工。如果忽视了这个实际，短期有可能消化了房地产库存，但放眼长远，又会为城市带来新的劳动力库存、造成社会公共服务短缺。

安土重迁，是我国传统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亿农民工之所以每年春节时奔波千里返乡过年，就是因为故土难离、乡愁难舍。要让农民变市民，并不是买套房子、换个户口这么简单；农民工市民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一哄而上，必须精准地分人群、分阶段、分地域有序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不妨参照易地扶贫搬迁中“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原则。按务工人员本身的城市化程度进行精准识别，分为可立即搬迁型——进城务工时间较长，具有在城市立足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生存技能，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可培育扶持型——有市民化的愿望和一定的城市立足基础，但是需要在生活观念和就业能力上完善提升；进城潜力型——务工时间短、流动性大的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生活有一定了解，但缺少一技之长和城市生活理念。

接下来，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各有侧重的扶持，做到有序进城，进城即稳。当然，还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推进过程要稳步。基层落实中央大政方针时，最忌讳急功近利。数据显示，全国有2.7亿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8亿，月平均收入为2864元。与此同时，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名外出农民工都能实现稳定就业，他们中不少人的收入水平还处在平均值以下。况且，常住人口不等于户籍人口，无论大中型城市还是小城镇，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户籍人口的涌入。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一定要立足实际，有序推进，切忌“毕其功于一役”。

保障体系要同步。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变市民，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换句话说，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对住房有需求，医疗、教育、养老等各方面的政策配套都必须及时跟上。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从暂住证到居住证，未尝不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种过渡方式，等到条件成熟再扎根落户，既给农民工全面市民化留出了准备时间，也给城市功能提供了扩大“内存”的接纳时间。

扶持政策要进步。对于农民工进城定居落户的扶持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办理贷款、发放补贴等初级阶段，要放眼长远，加大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总之，既要让民工变技工，取得在城市扎根立足的一技之长，实现长期稳定就业，还要让脱离土地的农民从户籍上和观念上变为市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城市生活。（2016年2月23日《经济日报》陈发明）

◆史海钩沉

王安石：官员不作为的背后

列宁把王安石称作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发动改革之前担任的职务，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财政官。他在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治理文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在宋神宗的爷爷宋仁宗的时候。他在当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来经常被大家传诵的名句：“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很显然，他把财政、税收、国家的预算看得很重，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大家都讲三代之治，但三代之治的时候，大家都很穷。而现在不同了，没钱办不了事，抓不住财权，是要丢江山的。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开头就说到，宋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皇帝是一个好皇帝，你简直可以比尧舜，简直比尧舜还辛苦。为什么国家治理一团糟呢？原因就是国家没人才。可是，每天这么多的人才在考试、选拔，怎么就没人才呢？他说，因为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对。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其法。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可是，我们现在教的都是课试文章，学的都是文章词赋，让一帮只会考试的人来治理国家。他们会写材料和作诗，会考试，会谈思想，但是，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所以说，教不得法。因此，必须废词赋明经，扫除课试文章，建学校。

养呢？他认为也不得法。他说，财政归于中央，于是中央有钱了，就养了大批的官员，官员系统搞得很复杂，文武分开了，官与吏也分开了，历代从没有像宋代养这么多官。他说既然有这么多官员，再多的财政也担负不起那么多的办公费用，于是，官员的薪赋很低，还不断地降薪，可官员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丧葬。官员正常收入仅够糊口，根本就不能做个体面人。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让官员做到公正廉洁，不容易。

取，他觉得也很有问题。他说历朝历代都是能够选拔有能力的人，简而言之，按照能力，择贤而用，但宋代却是一切都按程序走，每一个职务都要干过，每个台阶都要待过。实际上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其实每一个工作都没干会，或者说，他什么都会一点儿，其实什么都不会，因为干一段时间就调走了。既然选拔就是走程序，那么官员只要不干事，就不会犯错误，于是按部就班升上去的，大部分是庸人。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觉得也不得法。对官员，没有一个科学的考核办法。科举考出来的人治国理政水平很难加以检验。加上为了防止专权，官不久任，导致地方治理出现一系列问题。

因此，王安石认为宋代的根本问题是在顶层，官员队伍不够专业化。如果说改革要做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专业化。就是按照干实事的标准，去改革组织路线。

再一个就是王安石说的“养”的问题，宋代以来，因为皇帝处心积虑，解散基层的社会组织，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解散天下休息之”，所以，国家办事只能依靠官员，只能依靠官僚系统，结果，官员的队伍就越来越庞大，而工资却越来越低，它又是国家办事唯一依靠的力量，掌握着权力，怎么能不腐败呢？

到了宋代，官僚阶级就算彻底形成了，它与皇权国家之间是对立的，皇帝要控制官僚，而官僚就用腐败和不作为来反抗，因为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所以，官僚不作为，国家机器就运转不良，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2016年2月22日《北京日报》韩毓海）